

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5): 12-15.

- [2] 郭华瑜. 明代官式建筑大木作[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5.
- [3] 刘毅. 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4] 李菁, 胡介中, 王贵祥. 武当山玉虚宫玄帝殿及龙虎殿复原设计研究[J]. 中国建筑史论汇刊, 2010(00): 226-271.
- [5] 李超. 明庆陵祔恩门及祔恩殿复原研究[D]. 北京: 北京建筑大学, 2019.
- [6] 湖北省人民政府.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荆楚大遗址传承发展工程实施方案(2019—2023年)的通知[EB/OL]. 湖北省政府办公厅. 2019. 02. 02. http://www.hubei.gov.cn/zfwj/ezbf/201902/t20190220_1713593.shtml.
- [7] 张高荣. 新编灵泉志[M].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6.
- [8] 郭华瑜. 论明代建筑之斗拱用材等级[J]. 华中建筑, 2004(5): 131-132+136.
- [9] 梁思成. 清式营造则例[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 [10] 王晓东. 政府工作报告[N]. 湖北日报, 2020-01-21(001).
- [11] 尚涛, 侯文广, 宋靖华, 等. 古代建筑保护数字化技术[M]. 武汉: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荆楚人居环境传统营造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编号: 20YJC760145), 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基于符号学的荆楚地域性城市风貌规划研究”(编号: 20Y044)

作者信息:

邹 涵, 博士, 湖北工业大学土木建筑与环境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通讯作者)
zouhangogo@qq.com

刘润晨, 湖北工业大学土木建筑与环境学院硕士研究生
樊兢克, 湖北工业大学土木建筑与环境学院硕士研究生

杨锡宗的广州近代城市园林实践研究

Yang Xizong's Modern Landscape Architectural Practices in Guangzhou

孟诗棋 | Meng Shiqi

赵纪军 | Zhao Jijun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39X(2021)08-0140-05

收稿日期 2020-03-18

摘 要 该文综合而系统地探究近代广州著名建筑师杨锡宗的园林设计实践。基于对杨锡宗教育背景和执业经历的梳理, 尝试解读他关于城市公园、纪念陵园、大学校园的规划设计思想, 认识其设计理论和特征的变化, 从移植西方园林形式的“公共性”特征, 再到借鉴西洋古典建筑语言的“纪念性”风格, 回归于讲求本土形胜与礼制的“传统性”内涵。杨锡宗的园林实践深刻影响了广州近代城市园林的发展, 同时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汇与交融。

关键词 杨锡宗 近代公园 纪念陵园 近代校园 在地实践

DOI:10.13942/j.cnki.hzjz.2021.08.028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make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study on Yang Xizong's landscape architectural practices in modern Guangzhou.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Yang Xizong'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we attempted to interpret his planning and design concepts for urban parks, cemeteries and university campuses. We also investigated how Yang Xizong absorbed the public nature of Western public park, learned from the commemorative form of classical architectural language, and responded to the scenic spot and ritual culture for local innovation. Yang Xizong's practice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landscapes in modern Guangzhou and promoted the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Keywords Yang Xizong, Modern park, Memorial cemetery, Modern campus, Local practices

1918年, 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建筑系杨锡宗归国, 成立了岭南近代执业时间最长、业务领域最广的中国建筑事务所。学界对其建筑设计思想及实践多有关注, 如彭长歆^[1]基于设计生涯的时间序列和风格转型划分阶段, 评价归纳其设计思想; 黄元炤^[2]探讨了从景观切入建筑的具体实践与思想演变; 薛颖^[3]则论证了他“中国固有式”建筑风格的布扎建筑教育渊源。而对其园林实践的探讨主要包括若干相对独立的个案研究, 从中分析设计特点、艺术造型、社会功能, 如中央公园^[4]、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5-6]、国立中山大学校园^[7-8]等。本文拟基于此综合考察杨锡宗创作的近代广州园林作品, 以期更深入地认识其设计理念的动态演变, 剖析设计思想对设计实践的推动与引导。

1 中央公园: 基于西方园林形式移植的公共性

1.1 开启西方风景之窗

中央公园原址为历代王朝衙门在后园营造的园林, 旧称“万竹园”。隋朝时始为衙门所特有, 至清代成为巡抚衙门^[9]。20世纪10年代,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对广州的城市环境建设寄予厚望, 提出建设“花园城市”的构想, 倡议把清朝官署改建成供民众休息游乐的广州中央公园^[4]。其时杨锡宗受聘为广州工务局技士^[10], 市长孙科与杨锡宗对城建均有专长, 又有同乡之

谊,于是邀请他主持中央公园设计^[11]。

中央公园占地约9hm²^[12]。杨锡宗采用西方古典造园的几何图案形式,在公园场地的南北、东西向各设置1条主路,并设12条次路与主路形成方格路网,构成几何对称的平面骨架^[13](图1)。杨锡宗没有响应场地的原有条件,而是对地形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填平原原有池沼,将影响公园规整构图的百年古木悉数伐去^[14],沿南北中轴线依次设置公园大门、喷水池、音乐亭,形成新的景观序列。公园大门为四立柱通花铁门,饰有巴洛克式大涡卷(图2);喷水池位于南北主要道路交叉点上,是西方古典造园的通常做法;近水池处有白玉石狮,分立中轴两侧,原属清初平南王尚可喜王府,或因切合公园的空间构图而成为场地旧址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遗物;音乐亭大致位于公园整体空间的中心,成为视景焦点,另有4组花坛对称置于音乐亭前后^[15]。初建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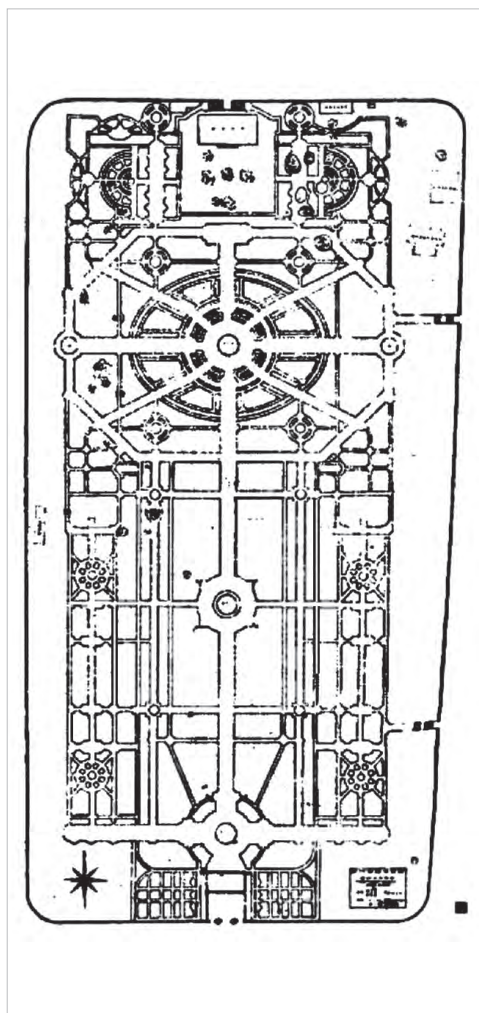


图1 中央公园规划平面图

公园园地平坦,空间略显单调,后又在西部空地开凿水池,并以余泥堆砌假山^[15](图3)。此外,杨锡宗设计了六座喷水池、四尊石像、一座假山,以及大礼堂、古物陈列室、射击场等园林建筑,虽然喷水池最终仅建成一座,娱乐设施也因一些外部因素未能全部建成,但中央公园仍不失为一座真正的综合性公园^[11]。

作为杨锡宗的第一次园林实践,中央公园显示了西方古典造园风格和公共空间模式的深刻影响,突破了传统园林形式而呈现出共享、开放的特点,反映了他强烈的个人坚持。同时,由于西方古典造园形式与建筑空间秩序的深刻关联,也能进一步理解杨锡宗基于西方建筑学背景的大刀阔斧的设计实践,并成为广州城市园林近代化的最为重要的先导之一。

1.2 新时代下的公园观

中央公园于1918年落成,是年广州市政



图2 广州中央公园南门



图3 广州中央公园西侧喷水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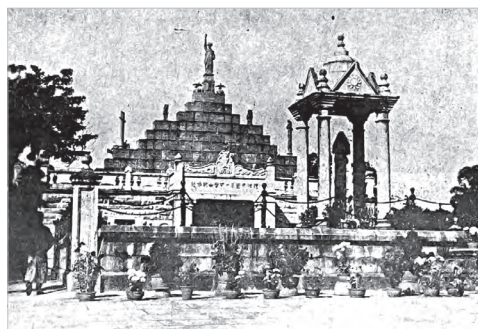


图4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叠石台

公所成立,城市新型市政体制由此萌芽^[16],并布告“曰设公园,西人称公园为都市之肺腑,盖市民藉公园以救济健康,犹人身藉肺腑以呼吸空气。”^[17]但杨锡宗在康乃尔习得的“学院派”教育与中国的传统审美观存在明显冲突,中央公园亦曾引起不少争议。1925年,《广州民国日报》即发表评论,认为“初建时无景致可赏,无高低之雅,又无大树遮荫,更有监狱式围墙,且无智识游民所到之地不甚洁净”,但“三年后,绿草如茵,枝繁叶茂,却成为提供清新空气的城市肺腑。”^[18]可见,民众对中央公园有一个从质疑到接纳的过程,由对新设计形式的陌生到新环境功能的认可,随着社会观念的转变,杨锡宗的公园理念逐渐显露出符合社会潮流的时代意义。

中央公园通过丰富的使用功能、规整的空间布局、别致的入口设计,满足了市民的活动需求,也带来了城市公共空间的新体验,成为都市中健康呼吸、感受自然的公共空间,成为广州开放发展的一处重要的城市标志。同时,中央公园与南侧的维新路(现起义路)轴线对位,成为城市后续发展的基点,与南北方向上“越秀公园”、“中山纪念碑”、“中山纪念堂”和“市政合署大楼”一起构成城市尺度的历史空间序列。中央公园所体现的公园观对广州城市公园和开放空间有着近代化意义,在空间领域融入了西方语言与近代民主政治精神的表达。

2 烈士陵园:基于西洋古典建筑语言的纪念性

2.1 “折中主义”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早在1918年,杨锡宗开始设计七十二烈士方表墓冢、自由钟墓亭,后续又完成了七十二烈士墓园的主体工程,包括七十二烈士碑、碑亭、纪功坊和四方池等,是近代中国最早的烈士陵园^[19]。其中,纪功坊是最为重要的构筑,其上设叠石台,叠砌144块纪念石,横列成崇山之形,是革命热潮高涨的象征;纪功坊顶端的自由女神一手高举钟槌,面对烈士墓碑亭的自由钟一手持临时约法,是依法治国的象征^[20](图4)。纪功坊由毛石砌筑,古朴凝重。纪功坊下半段开门洞贯通前后,门洞正面仿西方古典风格,双柱承接石额和山花。这些基于西洋古典建筑语言的设计塑造了墓园浓重的纪念氛围。

1930年,由于墓园经营者在园内设“黄



图5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平面图



图6 黄花岗烈士陵园的西南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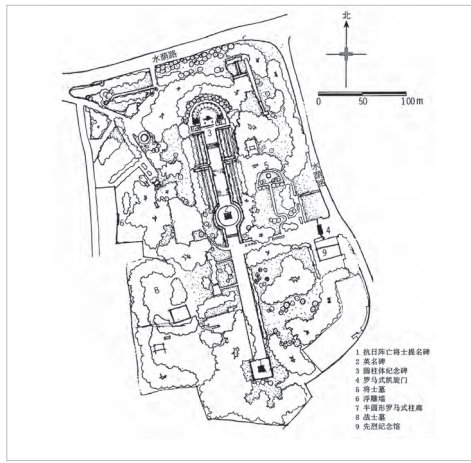


图7 十九路军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平面图



图8 半圆形纪念广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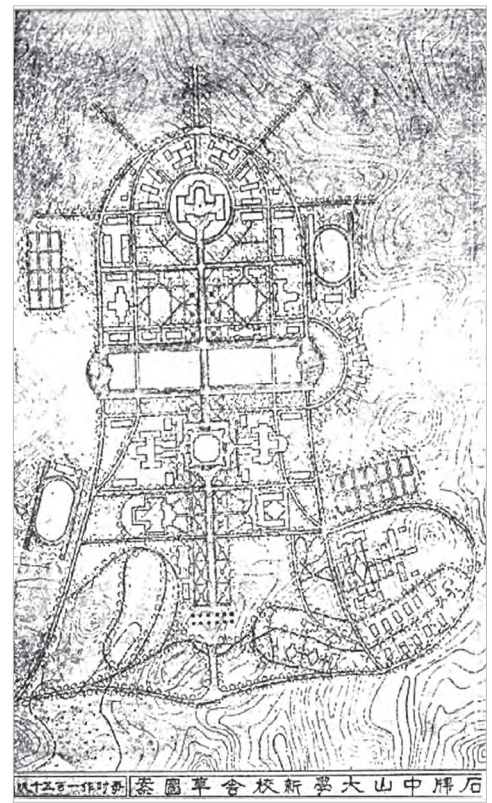


图10 国立中山大学校园规划图(杨锡宗方案)

花别馆”，烈士墓一时间成为粤中官员的“游宴之所”，而有损于纪念氛围^[21]。当局遂决议重修，再次邀请杨锡宗作为工程顾问，与林克明共同完成墓园新规划，包括新墓道和正门牌坊(图5)^[22]。新墓道的辟建裁弯取直，以塑造墓园的南北中轴线，强化行进过程中的空间仪式感。原本在正门处得以一览墓园全貌，但通过对地形的特别处理，行至默池上桥处只能目及陵墓顶端，使人不由低头俯视，而产生追念之情。新的规划秩序井然，从根本上改变了墓园原有布局，给人以庄严肃穆的崇高感。

墓园西部绿荫满庭、黄花遍地，另建有琉璃瓦、白石柱的四方亭和十字亭^[5]，呈现出中国传统园林与建筑的特征。这或为杨锡宗在其设计中进一步加入“中国元素”的场所文脉，从而在墓园空间的纪念性中增添本土化表达，如墓园西南角的赤色铁门，风格与中央公园南门相仿，由宽大的立柱和铁拱券构成，但又融入了“狮子”、“金钱”、“中国结”等传统石雕造型^[23](图6)，形成亦中亦西的“折中主义”形态，也可见杨锡宗在园林领域，相比他的建筑活动，更早呈现“中西合璧”的特征。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融会古希腊、古罗

马建筑语汇，是凭吊中国民主革命先烈的胜地，更是广州城重要的文化地标。杨锡宗的设计将烈士的人生价值、悼念价值同社会影响、革命精神联系在一起，使烈士陵园的纪念空间凝聚了革命情感的社会性与公共性。墓园空间语言的纪念性体现了杨锡宗对西洋政治文化与自由革命的时代意涵的充分理解，而得以综合西洋古典建筑语汇和本土文化要素来表达革命精神与祭奠意蕴。

2.2 “古典主义”的十九路军抗日阵亡将士陵园

1932年，为纪念在淞沪会战中阵亡的将士，杨锡宗设计监造了十九路军抗日阵亡将士陵园。这是杨锡宗完整参与、主持设计的第一个陵园作品，体现了鲜明的西方古典主义风格特点。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扩建时间与此园接近，风格却不尽相同。这大概源于两座陵园不同的历史背景与人文积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为祭奠民主革命烈士，平和、静谧的空间叙事手法烘托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精神；十九路军抗日阵亡将士陵园为哀悼抗日阵亡将士，纪念英烈的“神圣性”空间充满了对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强烈愿望。杨锡宗在十九路军陵园中展现了鲜明的个人古典主义风格，这个实践作品也被誉为他

执业生涯中的古典主义高峰^[1]。

陵园面积约6hm²，以一条长300m的墓道为南北中轴线(图7)。陵园建筑的布局循着自南向北的空间序列：抗日亭位于最南端，沿墓道行进，东西分别是将士墓和战士墓，场所情感在仿古罗马风格的半圆形纪念广场处到达顶峰。纪念广场中央的纪念碑为古罗马式的“图拉真凯旋柱”，碑前竖立1座战士铜像，台阶上卧伏2对铜狮，8个立鼎，用隐喻的手法表达了对“一二八”淞沪会战中牺牲将士的祭奠。纪念广场后方环绕多立克柱廊，两端则连接了相同风格的门亭，严谨对称的几何形态与空间形制营造了神圣肃穆的纪念场所(图8)。此外，西北侧设计了仿“凯旋门”式的入口，借西方政治文化中的凯旋、胜利意向凸显了陵园空间的纪念特质(图9)。

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相仿，杨锡宗在十九路军抗日阵亡将士陵园的设计中广泛运用西方古典建筑语言，多立克柱式、凯旋柱和凯旋门形制均表现了特定时局下的纪念蕴涵，从中可见杨锡宗对于西方古典建筑文化的充分理解，并恰如其分地应用于广州本土的纪念墓园实践之中，而在抗日阵亡将士陵园中没有像七十二烈士墓园那样加入“中国元素”，使得这种基于西方古典建筑语言的纪念

性更为纯粹。

3 中大新校: 基于本土形胜与礼制的传统性

3.1 “因借山水”的规划理念

在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新校(今华南理工大学和华南农业大学所在地)的竞标中,杨锡宗以反映中国传统思想特色的规划方案脱颖而出。由于校园基址面积广阔,远离尘嚣,适宜“藏修息游”^[24],他利用北低南高的地势、内部天然水塘,以中轴线贯穿中心区南北,与两侧环道构成校园整体布局。取南北走向的三条地形轴线为“山系”,又筑堤蓄池,分筑六湖,形成东西走向的“水系”。校园的规划布局融合山水,尊重环境天然形态,建筑布置其中,山水纵横交织,造就了山势苍翠、湖光潋滟的校园空间(图10)。

杨锡宗与当时的校长邹鲁共同规划了这座“池沼荡漾,冈峦起伏”的近代山水校园。从《国立中山大学新校舍记》中可看出,邹鲁对校园山水空间规划有独特的见解,以祖国“行省”“名山”和“大湖”命名具体道路与湖泊,譬如校内最大的湖命名为“洞庭湖”,文学院山头名为“衡山”等,真正“使人本校者,悠然生爱国之心,即毅然负与国之责。”^[25]可以看出,杨锡宗与学者的合作真正为规划内容注入“命运与共”的时代主题,整体增添了“忧家国之忧”的爱国精神和“保卫家国山河”的民族情感,恰合因循山川形胜的设计原则,呈现出浑然天成之妙,以及密切联系时事、心怀国运的人文主义色彩。

3.2 “明堂辟雍”的钟形隐喻

早在1925年,中山陵的设计者吕彦直已

采用“警钟”的形象作为陵墓主题,取“木铎警世”之意。1933年,杨锡宗设计的校园布局平面亦呈钟形排布,彭长钦推测杨锡宗可能受到了吕彦直的启发,虽有模仿之嫌,但评价杨锡宗对大尺度场域空间的把握能力,在近代岭南无人出其之右^[1]。杨锡宗的方案之所以拔得头筹,实则并非钟形寓意的简单模仿,而是有着充分成熟的设计思考与传统文化内涵(图11)。

中大新校建设之初,有若干小山丘,杨锡宗在山丘上分别布置5座学院。农学院位于钟顶,以强调农业乃国之根本;工学院、理学院居中,象征国之臂膀;文学院、法学院临近钟口,意在密切社会联系与服务^[26]。适逢日寇侵华之际,“钟”与“中”谐音相同,蕴含多重隐喻,或以“警钟”唤醒民众的爱国情怀;或是嘱咐师生铭记时间的流逝^[27]。此外,邹鲁还撰诗予以肯定,“院分文法理工农,全体形成恰似钟。若网在纲毫不紊,只想调恰不相冲。”^[28]可见,钟形规划正切合了邹鲁对各学院“互不相仿”的原意,结合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和校园文化,蕴藉历史与人文内涵。

杨锡宗、吕彦直两人“略合钟形”的巧思,既符合地形本身的需要,又寓意深刻的时代主题,这与两人共同的留美建筑背景不无关系,都体现了西方的民主主义精神和社会意识的思考。卢洁锋认为吕彦直设计的平面实为大钟与十字架的叠加,源于西方“十字架”作为文化符号的祭奠,遵循孙中山先生崇尚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督教信仰^[29]。不同的是,吕彦直以中茅山南的“覆钟之势”的偶然相合成“钟形”,而杨锡宗是受到山水空间地

形的制约,尽管力图顺应山水之胜,但钟形布局要求建筑、道路呈几何图案排列,与实际地形并不十分切合,故取消部分几何路网,调整建筑布局。钟形图案形成了具有时代内涵的“中山”符号,吕彦直将中山学说的集体理解凝聚成国家政治文化上的一种民族共识,而杨锡宗通过“明堂辟雍”的山水交织将中山精神注入近代高校融贯东西的校园文化风景。与初涉园林领域、营建中央公园时不同,杨锡宗没有为几何的平面形式再进行大规模的地形改筑,而是在尊重场本土山水形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加以利用,提取古代“辟雍”的平面图式,即古代太学的“辟雍泮水”格局。这亦是对孙中山先生遗愿的图形反映^[30]。大礼堂为校园的地理中心,周围众多的天然湖泊形若“辟雍”四周环绕之水。中轴线北端,农学院建筑群呈三合院式布局踞于构图正中,外设环路,体现了古代建筑布局中“天圆地方”的宇宙图式。

3.3 “融贯中西”的开放空间

石牌新校区的规划思想的成功之处体现在“开放空间”的设计理念,贯穿其整体和局部。杨锡宗通过学院分立与功能分区,广植绿林,不设围墙,使得校园空间开放自由^[31]。其中文学院和理学院居东,法学院和工学院居西,回应“左文右武”的传统礼制;男、女宿舍则分置东、西,反映“男左女右”的伦理秩序^[32]。可见杨锡宗对校园空间布局的立意依然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创新地融合欧美近代大学的规划体系,这说明杨锡宗在本土传统与西方设计思想的思辨中,主动融入当时的时代趋势,体现出“中体西用”的价值观。杨



图9 陵园凱旋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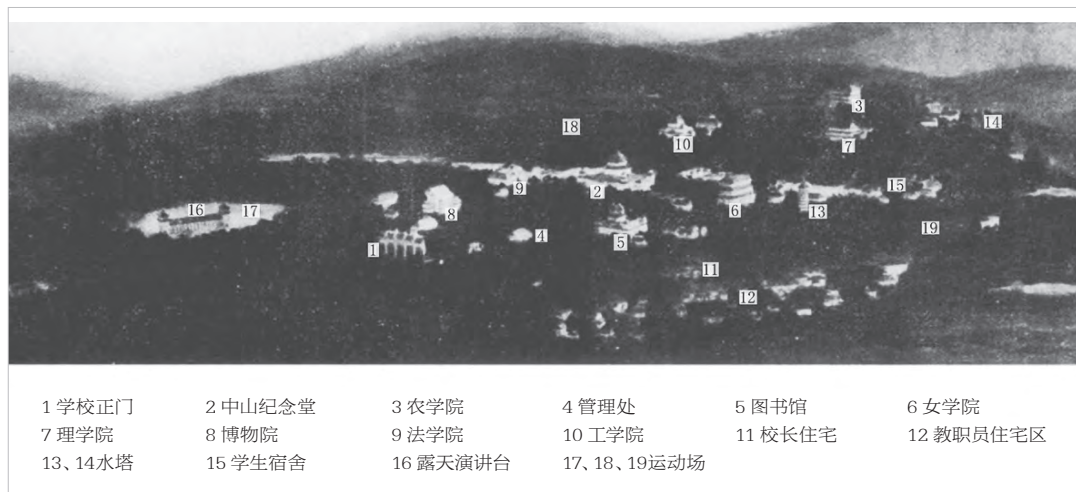


图11 石碑新校舍计划图

锡宗还在园林构筑的细部上融贯中西,例如石牌新校南门的石牌坊不同于纯中国式的古牌楼,而结合了西洋凯旋门形制^[33]。再借鉴西洋双体框架的同时,使用木棉花图案雕刻的传统纹样,以及饰有铜质衔环的狮头,使中国石牌坊与西洋凯旋门浑然一体,以精巧的细节赋予校园入口别出心裁的空间体验。

因此,中大新校的规划在体现中国特色的传统礼制观念的同时,借鉴、融汇了西方校园开放自由的空间结构与布局。杨锡宗由移植西方园林形式和运用古典建筑特征,逐步吸取欧美空间营造的开放理念,渐而关注使用人群与功能分区体系的实用创新,从而贡献了由中国人自己营建、既延续本土传统性又兼容西方开放性的近代校园规划典范。

结语

杨锡宗将西方建筑与园林文化植入中国本土的设计与营造活动,从广州中央公园对西方古典几何形式的移植,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中西结合的折中主义转变,再到十九路军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对西方古典建筑语汇的选择性借用,最后在中山大学新校规划中顺应本土自然形胜,融会东西方异质文化而主动创新。这些实践反映了杨锡宗响应不同地段条件、功能需求、文化取向而相应采取的适宜性设计手段;同时表现出对西方古典主义建筑和园林,以及中国本土文化两方面的充分理解,从而能在设计中将中西文化熔于一炉、并相得益彰,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古典式、折中式设计的鲜明特点,彰显了时代性与本土性,也为近现代园林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探索、创新的重要经验。

资料来源:

- 图1: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
图2:广州市市政报告汇刊[J]. 1924(2):10;
图3:中华实事周刊[J]. 1929(18):1;
图4、8:梁力.羊城沧桑[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39-40;
图5:郑祖良,文树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J].广东园林,1982(3):22-25;
图6:良友画报[J]. 1929(36):9;
图7、9:朱钧珍.中国近代园林史(上篇)[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52-54;
图10:易汉文.钟灵毓秀——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园

- [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5;
图11:陈国坚,华南理工大学人文建筑之旅(第2版)[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4.

参考文献

- [1] 彭长歌.岭南近代著名建筑师杨锡宗设计生平述略[J].华中建筑,2005(S1):121-124.
- [2] 黄元昭.杨锡宗:近代,从景观设计切入到建筑设计[J].世界建筑导报,2013,28(6):33-37.
- [3] 薛颖.美国布扎教育对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影响——以康奈尔大学吕彦直、杨锡宗为例[J].南方建筑,2020(1):20-27.
- [4] 孙易.广州近代公园建设与发展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0.
- [5] 郑祖良,文树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J].广东园林,1982(3):25.
- [6] 卢洁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J].建筑创作,2009(10):172-175.
- [7] 赵建华,郑力鹏.斯校矗立,蔚为国光——广州五山近代高校校园规划建设分析[J].中国园林,2008(2):80-84.
- [8] 毛祚月,李雄.近代广府广雅书院、岭南大学与国立中山大学校园规划比较研究——兼论西学东渐背景下的近代校园规划沿革[C]//IFLA亚太区会议暨中国风景园林学会2012年会论文集(上册).中国风景园林学会,2012:110-114.
- [9] 胡冬香.广州人民公园景观浅析[J].华中建筑,2007(7):115.
- [10] 广州市越秀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越秀区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158.
- [11] 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民国人物与广州城市发展研究[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0:41-42.
- [12] 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中山市人物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142.
- [13] 周向频.中外园林史[M].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14:299.
- [14] 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岭南近现代优秀建筑1911-1949[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2):257.
- [15] 周琳洁.广东近代园林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188-195.
- [16] 邵骏.试述孙科、林云陔与民国广州公园建设[J].岭南文史,2010(3):8-14.
- [17] 广州市市政公所布告第一号(1918)[Z].广州市

档案馆,全宗号24,目录号4,案卷号416.

- [18] 三年前的公园与三年后的公园[N].广州民国日报,1925-9-22.
- [19] 刘平.广州烈士陵园的发展变迁[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1:7.
- [20] 黄东兰.身体·心性·权力[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116.
- [21] 广东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广东美术馆.魂系黄花·纪念潘达微诞辰一百二十周年[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10):16.
- [22] 陆琦.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J].广东园林,2010,32(4):78.
- [23] 梁力.羊城沧桑[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1):43.
- [24] 国立中山大学.新校建设状况[M]//国立中山大学现状.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1937.
- [25] 邹鲁.国立中山大学新校舍记[J].三民主义月刊,1934,4(5):38.
- [26] 中国教育报刊社组.华南理工大学[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11):14-15.
- [27] 邹鲁.邹鲁回忆录[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266-284.
- [28] 邹鲁.国立中山大学新校舍记[M].国立中山大学成立十周年新校落成纪念册.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1934.
- [29] 卢洁峰.大钟与十字架的叠加——中山陵新解[J].建筑创作,2011(11):234-241.
- [30] 郑力鹏.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园建设的典范——原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园规划建设[J].新建筑,2004(6):64-67.
- [31] 赵建华,郑力鹏,屈寒飞.广州五山近代高校校园历史遗产特征及保护[J].建筑师,1988(3):211.
- [32] 阎瑾,刘立欣.关于原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区规划的几点思考[J].南方建筑,2006(4):80-81.
- [33] 卢洁峰.杨锡宗:为广州城留下建筑里程碑[M]//梁力.羊城沧桑1.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42.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风景园林‘前一级学科’时期知识生产及其演进机制研究——以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为例”(编号:52078227)

作者信息:

孟诗棋,华中科技大学城市与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
meredith9612@163.com
赵纪军,华中科技大学城市规划学院教授